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九月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插页2 163千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00

统一书号：11072.135

定价：0.76元

目 录

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	齐植璐 (1)
祖父严修在天津创办幼儿教育的回忆·····	严仁清 (46)
严氏女学的星点回忆·····	穆祥淑 (53)
回忆祖父严范孙家居琐记·····	严仁驹 (56)
一生热心兴学的林墨青·····	刘炎臣 (59)
殷墟文字专家王襄事略·····	龚作家 刘炎臣 (70)
画家植物学家陆辛农·····	王翁如 (85)

吴清源的围棋生涯·····	吴景略 (91)
---------------	----------

四行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经营始末记·····	胡仲文 (118)
天津证券行业的兴起和消亡·····	周志久 吴树元 (135)

·天津租界史料汇编之四·

天津德租界概况·····	俞志厚 辛公显 (151)
天津俄租界概况·····	姚世馨 (164)
天津奥租界的设立与收回·····	胡素文 (180)
我在天津礼和洋行的所见所闻·····	高渤海 (186)
我家三代买办纪实·····	王芷洲 (192)

走江湖的形形色色…………… 李然犀 (201)

质疑·订正·补充

美商收买《益世报》的经过…………… 张克明 (220)

补
白

严修编写《放足歌》(52) 严修为泥人张作传(55) 严修力
避与逊帝溥仪见面(58) 林墨青性格之一斑(69) 天津早年的
围棋活动(90) “起士林”的由来(150) 俄国商人巴图也夫
(179)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1—25辑总目录…………… (224)

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

齐 植 璐

-
- 一、家世与童年 (1860—1872)
 - 二、从庠序到翰苑 (1873—1894)
 - 三、黔中劝学 (1895—1897)
 - 四、桑梓兴学 (1898—1905)
 - 五、学部掌学 (1906—1910)
 - 六、里居办学 (1911—1928)
-

一、家世与童年 (1860—1872)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祖籍浙江慈谿。清顺治年间，其七世祖应翹以经商北来，定居天津卫，卜宅于西北城角文昌宫以西，地名四棵树，宅后临倭瓜园。严氏前后十一代，凡三百年，均居于此。南开学校前身的敬业中学、天津女学嘴矢的严氏女学亦滥觞于此。由于据说他家的远祖是东汉严光，所以严修曾撰其门联云：“邻巷四棵树，家江七里滩”（严光垂钓处），横额“故园瓜好”。

严修的父亲名克宽，字仁波，兼祧他的祖父道尊与本生祖父道亨。严修初名慎修，有兄名振修。后来其兄改名振，慎修

则改名修。又因道尊字师范，严修遂字范孙。其兄则因祖父道亨字字香，而字香孙。严修还别字梦扶，小字玉珪，据说是由于他降生前夕，其父梦见有人赠以玉杖的缘故。晚年别号倬屨生，典出《荀子·修身篇》：“难进曰倬，易忘曰屨。”

严修的本生祖父字香（1805——1872年），年青时帮别人经营盐业，到咸丰初年自己占有引地，行盐于顺天府（今河北省）之三河县。咸丰八年（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侵入天津，严氏全家避难于三河县的段家岭。三年后，就在这里生下了严修，时为清咸丰十年庚申三月十二日，即一八六〇年四月二日。

严字香稟性慷慨，有任侠之风，肯于急人之难，虽家境并非宽裕，赈恤亲友从无吝色。此一品格曾给幼年的严修以深刻的印象。

严修的父亲克宽少年时曾治举业，因应童试未中，遂弃儒专佐其父操持盐业。他自同治庚午（1870年）起即担任长芦纲总，先后共达十年。平日治事公正持平，不辞劳怨。地方每有兴举，必就商于他，并请他襄理其事。常设者如育婴堂、恤嫠社、施饘社、牛痘局、惜字社、备济社、灯牌公所，临时举办者如冬季粥厂、四乡放赈，还有书院值年等公益事务，可以说他是无役不从，而且无不黾勉从事。他承办服务，往往先派人分往四乡调查贫苦人家户口与生活情况。严修兄弟有时也奉命同往，使能了解一些民间疾苦，因此严修十六、七岁时就曾跑遍天津西、北郊各村庄。祖父、父亲这种种言传身教，对青少年时代的严修无疑的会起到很大的影响。

严修三岁（1862年）时，祖母逝世，才从三河迁回天津。六岁，开始入塾，从查帖青读书，开蒙课本为《龙文鞭影》，因

能属对为老师所称赞。七岁，从孙竹泉读。八岁从周玉山读，开始作试律。十岁，从沈季平读，读完了“四书”。十一岁从于筠庵读，开始习作小讲，每月三、八日作时文，逢六作律赋，皆能遵限当日交卷，很为其师所称许。从这一年起，直到十六岁，他跟着这位当时也是天津名诗人的宿儒良师学习了五年，从而获益非浅。十二岁时，其兄严振应县试，他请于其师，一定要随同入场一试，结果榜发被黜，使他感到：“一出铍羽还，始知谈何易！”（乙丑《杂忆儿时琐事》）

十三岁，应县、府试。

二、从庠序到翰苑（1873—1894）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严修十四岁，应院试，被录取，入府学。次年，应岁试，取一等第七名。自光绪二年至七年（1876—1881年）间，他从举人张绅（子笏）学，曾用功读“四书”、《诗经》、《书经》、《礼记》、《左传》、《纲鉴》与《朱子汇参》，并到辅仁书院按期应试各课，也间或应问津书院月课，所作课艺常名列前茅。

严修十八岁，应院试补廪膳生。是年，始识博通西学的陈奉周，与之游，深获讲贯之益。二十岁应乡试，未中。因侍父病，辍学。翌年，父谢世，重温旧业，攻读益勤。除读完“五经”外，兼读《国语》、《文选》、《绎史》等书，并旁及笔记与类书，始习算术。二十二岁时见到了当时任问津书院山长的张佩纶，甚受赏识，并由张引见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转年，中壬午科乡试举人。正考官徐桐对他的经艺卷大为击节称赞。

光绪九年（1883年），严修二十四岁，得中会试，改庶吉士。清

制，庶吉士经馆选后，三年考试散馆，按优次等第，留为编修、检讨等职。严修为了准备考试留馆课，曾谒见张之洞与张佩纶请益。张佩纶对他说：“学人之精力，两事困之：一为经学，钩稽繁引，累世莫殫，虽通经实不足以致用；二为词章”。又说“宜古宜今，有体有用，莫如读史。”这些话后来对严修的治学旨趣与学习态度都起到一定的影响。从此，他较多地致力于《史记》、《汉书》、《通鉴》，也兼及《说文》、《尔雅》。虽说所习多为准备留馆考试之用，但已转向于以实用为主，拿出了较大的精力来学习《勾股举隅》、《勿菴算书》、《数理精蕴》、《地球新录》、《天文启蒙》、《格致入门》等数理化书籍及《伤寒明理论》、《医学源流》等医书，并演算勾股开方及炮操算法，所涉猎的四部群书也多系有裨世用的，如《梦溪笔谈》、《齐民要术》、《国朝先正事略》、《圣武记》等。

严修二十五岁那年年底，赴三河借居盐店读书。这时，他是满怀经世致用的信心与抱负的，临行前有《口占留别陈奉周》一诗明志：“世事艰难少不更，悔从纨绔度生平。晏安况味真无赖，剽窃工夫浪得名。知耻方能成大器，有才便不畏虚声。男儿胆气须磨练，要向风波险处行！”

他留三河一年，除刻苦攻读外，还两游盘山，并探访当地文物掌故，风土民情，写下了好多首反映乡村旧腊新正景象、官场客套、民间淳俗等富有生活情趣的诗篇，和记述诸如铜作制器、涂树避蠹、马戏表演之类闻见琐事的日记。他并没有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而是肯于接触下层社会，开拓自己视野，这同他后来的关心世运、讲求实际的思想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严修回到北京，四月散馆，授编修，冬，补国史馆协修，光绪十四年四月与十五年四月，两次考试

差。十五年二月光绪亲政，严修于十一月膺选充任会典馆详校官。翌年，充直隶省乡试试卷磨勘官。光绪十七年及十九年又两次考试差。光绪二十年大考二等，考试差。光绪帝曾先后召见三次。八月，授贵州学政，时严修三十五岁，正值甲午中日战争之年。

严修在京供职的八、九年中，由于有了更加充分的时间可以利用，他得以博览群书，以充盈腹笥，开拓眼界。除重温“四书”、“五经”、“四史”、“宋五子书”外，还阅读了一些文集、笔记、政书、奏议，演作过几何图，行星、四时、日月蚀图，十二宫及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图，以及车舆、考工记各器图。他常年坚持临帖、写白折，后来还学绘画。平素爱好观剧，还读《瑟谱》，研音律，喜好吹箫。对鉴赏文物字画，也很有兴趣。

他平日特别注意个人道德修养，在日记中常有自讼自责之语，严于律己，对败德逾矩之事，往往提到“人禽关，生死门”的高度，来“懔之戒之”。

这十几年的科场甘苦、宦海浮沉，使严修在思想上有了深刻的感受与体会。“十年宦味语长安”，归结到两句话，就是“苞苴事业污人易，袍笏文章问世难。”（1893年《冬日还京途中作》）夤缘奔竞，货贿公行，吏治腐败，同流合污，而官样文章、制艺文字又无裨于世用。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严修这一有心人的深思。他探索所以致此之由，已开始觉察到当时科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漏罅与积弊。这在他光绪十五年（1889年）《复姜少云》函中说得甚为透剔：“读书应试，但薪科第；迨其通籍，便望迁除。”读书全为猎官，而居官又随波逐流，尸位素餐，“传舍之徙，既弊其神明，繹轹之例，又夺其夙习”。“堂司之权掌于

吏胥，牧令之命持于门印，幸而无事，则循良上荐……治不自知之事，居不自主之官，名利两丰，何惮而不为耶？推之衡何莫不然？”这是他时常忧虑的，因而立下为国家作育人，以补偏救弊，力挽末流之失的志愿。他就是这样抱着“冀不渝夫初志，庶少答夫圣恩”的心愿（《到黔报接印日期折》），踏上黔轺五千里的征途。

三、黔中劝学（1895—1897）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严修简授贵州学政。他九月出都，取道清苑、安阳、郑州、新野、樊城、江陵、常德、沅陵入黔。十一月抵贵阳，就任。

严修在贵州学政任内，锐意兴革，显示了他卓越的器识与才华。三年瓜代离任之时，黔中士子为他树去思碑与誓学碑，称颂为“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这都不是偶然的。

接篆之日，严修即上折奏报接印经过，这一奏折也就是他在黔一切措施的方针与要旨。他表示要“严去取以覈真才，慎关防以祛诸弊，揆圣贤立教之意，有行重于有文；体朝廷眷士之心，所习必课诸所用。”这段话正是他崇实学、育真才这个一贯主张的集中体现。

下车伊始，头件事是“观风”，即巡赴各州县命题课士。所发《观风告示》，也就是他的按试纲领。他考课生员，出有策论四题：一、辨志，问“志趣何如”，“愿治何书”；二、明师，问“夙所宗仰”；三、评文，使试评“浅深同异之故”；四、匡时，使各举所知“军国富强之策，民物利病之源”。四题之间，有一个中心的宗旨和要求来贯穿，那就是打破一切拘墟与迷信，“勿

空言，勿耳食”，敢于独立思考，“词必己出”，而且要“畅所欲言，无有逊避”，“抗希古人不为僭”，“视举时贤不为私”。也就是说，要敢于向权威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特别语重心长的是，他在论题小注中所说：“方今时事，急需才矣！诸生有熟于经世之学者，各举所知，以相讨论，范文正作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愿诸生效之！”以上这些话，对于那万马齐喑的当时，夜郎故国的当地来说，不能说不是一声木铎晨钟！

莅任不久，严修又发出了《劝学示谕》，这是他一向所主张的为学要旨。文告中首先切中时弊地指出：“方今士习之蔽，大要有二：朝而时文，夕而试律，迂道德而不谈，束经史而不观，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其蔽一也。口则诗书，心则货利，身则庠序，行则穿窬。言不能顾行，行不能顾言，其蔽二也。”要祛除这种学用脱节，言行不一的大蔽，就必须“讲求为学之本原，推究读书之实用”，在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上来一个彻底的改变。因而他在这里提出了“反己自证”这一新的命题。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联系思想实际，作自我批评与检查，用生活的实践来检验自己学习的成果。如“言礼义忠信廉耻也，则思我之应事接人、去就取与之间何如”。如已做到，自可“怡然自谦”，如未做到，则必应“蹶然自奋”，如正“中吾之病痛，或发吾之隐伏”，则“必有皇皇汗下，似若无所容者。”在文告的中心部分，他更强调地指出：“天下之治乱，视乎人才之盛衰。今日读书，他日致用，非止为进取也。”因为欲得朴雅之才，所以对诸生更需要“校其文艺，以覘其所造；察其气质，以验其所养；面课其言论，以测其浅深；密访其行谊，以覈其真伪。”“浮薄傲戾者，名虽久著亦黜之，以儆效尤；敦笃纯实者，文虽未工亦进之，以资矜式。”这都充分体现了他所倡导的“敦品励

学，讲求实用”的教育思想。

严修在黔，第一年按试了安顺、遵义各府，第二年按试了下游平越、都匀各府。所至循名责实，严格去取，特别注意剔除积弊。严禁考生冒籍、枪替，并示诸童互相纠查，如能指攻确实，格外奖赏，使作奸之徒，闻风敛迹。此外对补廪、候廪，出贡的生员交纳上费的弊政，也予以革除，使许多寒士受惠不小。

严修鉴于贵州地处边远，风气比较僻塞，为了启迪民智，开拓文风，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严修出京入黔，虽轻装简从，但携书甚多，达十四大箱。抵黔后又捐廉购进了一批书籍作补充。大部分都拿出来置存学舍，供士子浏览。后来又与抚藩协议，筹立官书局，刻印书籍，发售各州县，置放学舍，以供阅览，并以看书之多寡，作为士子勤惰考察之标准，学官奖惩之参证。他还翻刻《书目答问》等读书指导一类的书，教士子以读书之法。每月终审阅读书日记、省身札记，对成绩优异者，给以书资与膏火的奖励。

贵州原有正本、贵山、学古三个书院，为了加强施教，严修改组了学古书院，手订《肄业条约》，令各州县保送优秀生员四十人住斋肄业。聘黔省名儒雷玉峰主讲席。所习以经史、算学为主，兼习时务、政要。他还曾电请湖广总督张之洞协助征聘算学讲师，并每日亲自前往督课，为学生解答算题。

严修感于兴学敷教必须形成风气，乃使雷玉峰发起组织协会，约集同人，共申条约，以相互砥砺，使学风为之一振。

严修诞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兵燹之中，从他束发受书到居官翰苑的二十年间，正是古老中国发生历史巨大变革的时期。他的家乡天津这时已被迫开为商埠，辟有外国租界，成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侵略的桥头堡。外国人开设的洋行、教堂、学校、医院相继出现。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也于此时应运兴起，以天津为中心，办起了洋务学堂、制造局、铁路、轮船局等新型事业。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关心国家命运的严修，在思想上不能不有所触动。他出任贵州学政之年，又正是中日战争中国败衄的一年。次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满清政府丧权辱国，更使莽莽神州濒临危疑震撼之秋。严修在贵州听到这些消息，深感“厝火积薪，危若燕幕，感时纾轸，如何可言！”（1896年《寄辛蔚如》，见《蟬香馆书牍》）认识到“承敝易变，事有必然”，而自己却是“明知救时才俊，必不出于八股试帖之中，而较短絮长，执以进退。虽职思当然，不自觉其兴味之索然矣！”（同前）“朝廷当旁求俊义之时，学臣有教育人才之责。一筹莫展，负疚滋深！”（1896年《上张子笏师》），因而下决心要“研精课实，以应当事之求”（1896年《寄华璧臣》）了。

是时，康有为等在京已有公车上书之举，万言书辗转传抄，强学会也展开活动。他们的那些维新论调与严修的看法正不谋而合。这时，严修已痛切地认识到“科举法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若一无变通，似于作育之道亦有未尽。”（1896年《复柯逊庵太守》）“近来时局日新月异，泰西诸学，俱为当务之急。”（1896年《上尹琅若师》）“不此之务，势将不拯！”对昧于时势的陈言积习，必须彻底予以扭转。他也意识到了：“迩日当轴颇务改弦，意者机殆将转乎？”（1896年《寄辛蔚如》），并在一封致徐世昌的函中赞许“康长素之疏真卓论也”（《黔轺信草》），肯定了革旧维新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推动下，严修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突破

性的变化，这具体表现为一八九七年八月他的有名的请开经济特科奏折的提出。在这个奏折中他突出了“非有旷世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材；非有家喻户晓之新章，不能作兴乎士气”的改革与求实精神，提出了仿照康熙、乾隆年间两次举鸿词、一次举经学的特科的先例，打破常格，另设经济特科，对“周知天下郡国利病”者，“熟谙中外交涉”者，“算学译学擅绝专门”者，“格致制造能创新法”者，“堪游历之选”者，“工测绘之长”者，“统立之专名”，予以量材取用，同于正途。并规定“去取无限额数”，“录用无拘资格”，“赴试宜筹公费”，俾天下有志之士“争自濯磨，翕然奋兴”。为了减少阻力，防止幸进，还规定“责成内外诸臣搜访保送，蔽贤者惩处，荐贤者上赏。”法良意美，也充分体现了严修的深谋远见。

严修的奏开经济特科一举，在他的一生历史中，乃至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都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因为它不仅切中科举制迂腐空疏的积弊，打破了唯一的通过八股以取士的渠道，也为学习西方文明，使新兴的有维新思想与技能的人才跻身政治舞台，打开了一线通道。但严修毕竟是一个出身于封建阶级家庭，受过一整套封建儒学教育，并且已沿着科举的阶梯爬到统治阶级上层的士大夫阶层，他的变革旧制、学习西方的思想不能不表现出很大的软弱性与局限性。他不能断然忘情于他自己所走过来的道路，也不愿甘冒离经叛道之不韪，一下子断绝了那一大群与八股文字性命相依的生员士子所必经的出路，所以他并没有提出废除科举制的明确主张，只不过在“科举未能骤变，学额又未能遽减”的情况下，开特科以为权宜，仍与八股取士并行而不悖。这样做，其作用正如梁启超在评论此事时所说的那样，“得此亦足稍新耳目”而已，是起不了多大

的实质性的变革效果的。但在当时，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极为迁就的修补方案，也还是因触怒了那些顽固分子而胎死腹中，并为严修本人招灾惹祸。

严修此折奏上，光绪帝于次年五月诏谕：“所拟六条尚属详备，即着照所请施行，并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各举所知，保荐人才，限于三个月内迅速咨送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请考试，一俟咨送人数足数考选，即可随时奏请，定期举行。”（总理衙门、礼部《遵议经济特科详细章程疏》附片）但诏下数月，顽固派大臣仍迁延不肯荐人，严修的座师大学士徐桐甚至因此而拟削去严修门生籍，竟传语门房：“严修非吾弟子，来谒不准通报。”迨至八月慈禧政变亲政，此议更无形夭折报罢。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严修任贵州学政期满离省，取道岳州、武昌、上海，到慈谿故乡扫墓。翌年三月，回到天津。由沪搭新裕轮返津途中，曾与梁启超、康广仁相遇畅谈。

严修贵州学政一任，因捐廉为士子购书、作奖金，所费不貲，任满还京不仅宦囊如洗，而且负债累累，只好托至戚举债，借八千缗又两千金于德厚堂，总计负债四千两。

四、桑梓兴学（1898—1905）

严修一八九八年三月返抵津寓后，闰三月十日晋京觐见光绪帝于颐和园。十四日谒李鸿章。四月，于徐艺甫处见康有为，因彼此心仪已久，所以虽系初会，亦畅谈甚久。越五日，与康及梁启超等陪日本公使小聚。是月底赴小站访当时任营务处总参议的同里同年至交徐世昌，并经徐的介绍，认识了袁世

凯与段祺瑞。八月因见忤徐桐之故，被免去翰林院职务，仅留编修空名，全眷由京返津。八月十六日，慈禧政变临朝，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严修因在百日维新中很少在京，亦未参与康、梁之事，故得免于难。

是年冬，请张伯苓来教严氏子弟及故人子陶孟和。讲授科目有英、算、理、化诸科，当时称为西学。

一八九九年，严修四十岁。有《四十自述》诗：“我年二十失双亲，又作孤儿二十春。八载京华糜廩禄，一官天末厌风尘。心伤岛国沧桑古，肠断鸰原墓草新。除却向平婚嫁事，世间无所用斯人！”（其兄香孙于上年六月去世，第六句故云）长才未展，事与愿违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起。六月，八国联军侵入了天津。严修全家未及远避，且有戚友四十八家投他家避难。他亲眼看到当时地方糜烂、生灵涂炭的惨景。这场创痛剧深的、比以前的英法联军、中法、中日各役都严重得多的民族大灾难，使严修深受震动。此时，他不由得不觉察到，时艰势危，当务之急，已不仅在于人才的培养与选拔，而更重要的则在于民智的启迪与开通。要达此一目的，那就决非在旧式儒学与科举制中兜圈子，修修补补，所能济其事。而需要重新另起炉灶，认真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科学，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创办新式学校，普及国民教育，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从养士教育到新民教育，这是严修思想的又一突破性的变化，是他从一个儒学教育的改良派转为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的历史转折点，而前此的奏开经济特科只不过是他就从科举制度走向近代教育的一道桥梁。

要学习西方，引进资本主义文化与教育制度，就需要到外

国去学习与考察，以探求办新式学校的模式与途径。而出洋考察，应先去何方呢？严修在这里首先选中了日本。理由倒不只是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路近费省，更重要的则在于两国的国情相似。严修既寄希望于清室的中兴与维新，主张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那么日本的明治维新自然就成为他所向往的鹄的与典范了。这就是他为什么在短短的两年内“两度瀛山采药归”（《五十述怀》）的缘故。

一九〇二年清政府从八国侵略军的殖民统治机关“天津都统衙门”手中接管了天津城，地方局势比较稳定了，严修也实现了他赴日本观光学习的意愿。从是年七月到翌年九月共在神户、东京呆了一年又三个月。他所参观的范围非常广泛：政法机关有贵族院、众议院、大理院、东京府署、警视厅、控诉院、地方裁判所、鸭巢监狱；社会福利机构有慈惠院、养育院；实业单位有纺织会社、麦酒会社、商品陈列所、电话局；文化机构有博物馆、水族馆、《朝日新闻》社。后一时期，同由清廷派来日本考察的五品京堂、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挚甫）一起参观时，更把重点放在教育事业上。他们参观了帝大、早稻田大、医大、农大、高工、高商、高师、女校、医校、音校、体校、美术学校、聋哑学校、小学、幼稚园与同文书院、庆应义塾。他们还访问了近卫公爵、大隈伯爵和嘉纳治五郎等教育家。严修每到一处，看得都非常用心和仔细，并随时作了记录，说明他对于日本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实行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经验是如何加意去探讨，特别是在教育思想方面，他所受的启发很大。他很欣赏日人福士在去神户的船上所说的“宜采东西文明利器，开我富强”那句话，认为“言之成理”。他对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所说“取人文明，则己之文明自进”，